

***A Northern Alternative: Xue Xuan (1389-1464) and the Hedong School.* By KHEE HEONG KO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xiii, 353pp.**

本書作者許齊雄，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曾先後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此書即是在其2006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

全書除導言和結論外，分為五章。第一章通過還原薛瑄的生平和師承，從理學發展史的角度給薛氏和明代北方理學重新定位。作者認為目前學術界多關注南方理學的興起和展開，而忽略了北方理學發展史，而這一現象可追溯至黃宗羲兩部「學案」的編纂。於是作者檢討了《明儒學案》貶抑薛瑄和河東學派學術成就的不足，認為黃宗羲此舉原因有二：一是黃宗羲的陽明學立場，二是明末北方學術的衰落。黃宗羲的觀點因被近代錢穆、容肇祖等學者接受，用以描述明代學術史，對現代學術研究影響深遠。作者接着通過敘述薛瑄的生平，以說明其沒有明確師承的學術背景，這與金華學派從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到方孝孺的學術傳承模式有別，作者認為這正是明初北學與南學相比所具有的特色。

第二章主要討論薛瑄的思想，尤其是他的道統觀、理氣論和復性說。《讀書錄》作為薛瑄平時讀書和反思的記錄，是研究其思想的最重要文本，但是前此學者大都以靜態的觀點利用《讀書錄》解讀薛瑄的思想，忽視了其思想的動態發展。因此作者首先恢復了《讀書錄》的編刻史，指出此書在後代被廣泛閱讀，尤其強調《讀書錄》和《讀書續錄》編纂時間上的差異，前者成於宣德七年（1432）左右，而後者成於天順三年（1459）。通過利用先後兩種《讀書錄》，作者對薛瑄思想進行了動態分析，並指出理氣聚散的討論（最著名者是日光飛鳥之喻）在薛晚年時很少述說了，復性說則在其晚年漸漸成熟，並作為學術宗旨而每每提及。薛氏還從「萬物一體」、理氣合一的角度，認為復性與治道是不可分的，這成為他重視國家機能的哲學基礎。相對而言，薛瑄對道統傳承的理解前後較一致，即不強調直接師承關係，這跟金華學派的學者不同。薛氏認為孟子與二程、程子與朱熹、朱熹與許衡之間有三次道統傳承的中斷與接續，雖然他自己沒有明說，但其弟子則將許衡與他視為第四次道統的中斷與接續。

第三章主要討論薛瑄家族以及薛瑄的家族觀。作者通過分析薛氏後人的

生平事蹟，發現薛的族人在傳播其學說中的作用並不突出，這與張藝曦在《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6）中所揭示的吉安府士人通過家族網絡積極推廣陽明學的現象有異。作者接着從社會身份、婚姻型態、命名模式、宗法制的接受程度以及公共工程開展等方面分析薛氏家族，認為明代薛氏在當地勢力並不強大，宗族活動也不興盛，其宗族活動的開展應在明清易代之後。作者又根據薛瑄撰寫的眾多族譜序指出，薛瑄雖然肯定士大夫通過族譜敬宗收族的做法，但他的着眼點在於真實記錄祖先的豐功偉績，以保存家族的榮耀，激勵後人奮起。作者將薛瑄對家族的看法與方孝孺、楊士奇等南方學者比較後發現，薛瑄更注重朝廷，缺少南方學者的地方意識，所以作者認為中國南方尤其是廣東等地依靠宗族和國家的關係來維持社會日常生活運行的模式，不適用於明代中國北方地區。作者最後又以明代前期與薛瑄擁有同樣家族觀的北方學者曹端為例，證明南北學者之間觀點的差異。

第四章主要揭示薛瑄以及河東學派學者重視官學的教育理念。作者借助薛瑄和李賢的兩次書信討論，展示薛瑄全力支持官學、不重視書院教育的理念。薛氏認為成聖可不經師生授受關係，可以透過學習經典自得而成，這種經典學習在官學即可完成。薛瑄雖然沒有學派建構意識，但他的學術跨越河津地方，傳播到陝西、河南等地。作者認為薛氏不發展書院的教育理念，與南方吳與弼、王陽明等學者遠離政府積極開展書院教育的行為不同，代表了一套新的學術典範，並為清代學者的學術選擇提供了陽明學之外的另一候選對象。

第五章主要重建了薛瑄從祀孔廟的過程。作者將這一過程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成化、弘治時期，薛瑄因「明道著書」不足而被拒絕，其支持者因此開始編刊《讀書錄》。二是嘉靖年間，薛瑄支持者在回應「少著述」的挑戰時，不僅援引《讀書錄》為其反證，更重要的是開始質疑「著述」是否應為討論儒者從祀的標準。他們認為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功」可報，「立德」和「實踐」應被視為明儒的成就與功勞，著述多寡不應再是從祀的標準。當時雖然支持者眾多，但因嘉靖皇帝否決，故未成功。三是隆慶五年（1571）成功入祀孔廟。薛瑄此時能夠進入孔廟，得益於在與王陽明從祀競爭氛圍下程朱學者的推動。作者在還原薛瑄從祀的過程中，注意到當時有反對者以金華學派師徒傳承模式質疑薛瑄與朱熹的學術傳承關係，作者認為薛氏從祀標誌着明儒擺脫了學術系譜式的從祀標準，創立了明儒可獨立興起以明道的新標準。

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普遍方式是，分析某一哲學議題的出現及其演變，或是某一人物思想的專題研究，而這一人物的思想常被默認為靜態的存在，並被切割成理氣、心性、知行關係等方面加以描述。近來學者開始結合政治史、社會史的研究路徑探討中國思想史，韓明士(Robert P. Hymes)、包弼德(Peter K. Bol)是這一取向的先行者。本書作者深受韓、包二人的影響，書中雖涉及薛瑄道統觀、理氣論、復性說等哲學議題的探討，但均以歷時性的方式展現薛瑄思想的變化過程，且注重敘述薛瑄的社會實踐及其身後形象塑造問題，是一本典型的借鑒社會文化史研究方法研究思想史的專著。

明代思想史的研究，長期未能擺脫《明儒學案》敘述框架的影響，使得與陽明學有關的儒者持續為研究者所關注，薛瑄這位明代從祀孔廟的當朝「真儒」卻長期被忽視。此書以薛瑄為主要研究對象，旁及同時期曹端等北方著名學者，豐富了我們對明初河東學派和北方儒學發展的認識，書中還不時以南方儒學發展狀況作為參照系，歸納出北方儒學具有不強調師承關係，對朝廷事務的重視勝過對地方事務的關注，注重支持官學發展而相對忽視書院教育等特徵。這種南北比較的視野已經突破了對薛瑄個人研究的範疇，顯示了作者廣闊的學術關懷。

南北儒學的比較雖有利於凸顯差異，但同時也易於導致南北儒學對立化，過度拔高薛瑄的思想及其地位，並賦以典型意義。作者深受韓明士精英地方化和包弼德的地方精英乃理學主要贊助者觀點的影響，容易帶着地方主義(localism)的認知探尋薛瑄的思想及其實踐，發現薛瑄重視朝廷、支持官學的獨特表徵，而忽略了「外王」和朝廷從不曾遠離士人的頭腦，即便熱衷地方實踐和書院創建的陽明學者，亦不曾放棄朝廷政治。本書將明初金華、江西的儒學以及明中後期的陽明學統稱為「南學」，歸納出「南學」具有強調師承關係、關注地方事務、積極建設書院等特徵，進而與薛瑄思想作比較以凸顯南北儒學的差異。但明初金華、江西學者與後來的陽明學者並不完全符合上述三個特徵。以書中屢次用來與薛瑄作比的金華學派為例，他們雖然強調自己的師承，但宋濂、方孝孺等大半生處於朝廷而非地方，且沒有積極從事書院教育。本書第三章對南北宗族發展的比較，亦值得進一步推敲。南方宗族建設以廣東為例，在明嘉靖前後才有霍韜、方獻夫等學者開始討論宗族理論，推動宗族建設，但宗族的普及化是在明清易代之後，這與書中所述山西薛氏宗族建設的開展在明清易代之後的步調是一致的，所以作者指出的南北宗族建設時序差異的描述，也許並沒有實際歷史進程那麼大。本書第五章認為在明代前期，金華學派式宗譜結構型比薛瑄獨立興起型在孔廟從祀中更

具優勢，實際情形則是，薛瑄與金華四先生雖在成化年間同時被題請從祀，但金華四先生晚至雍正二年（1724）方獲從祀孔廟，比薛瑄遲了一百五十多年。

洪國強

中山大學歷史系

***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 By TOBIE MEYER-FO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xiii, 316pp.**

自廣受矚目的前著*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問世十年之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教授梅爾清(Tobie Meyer-Fong)推出了她「十年磨一劍」的新作*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 (《浩劫之後：太平天國戰爭之遺產與19世紀之中國》)。此本「目光向下」、以新穎獨到之視角重新檢視太平天國運動的著作，憑其不落窠臼的研究角度，將「太平天國」這樣一個國內學者皆認為「做不出新名堂」的「老」題目寫出了新意。

本書聚焦社會底層百姓，關注在這場大規模內戰中，民眾浮萍一般的命運及其為求生而做出的努力、地方士紳對於社會道德秩序的重整、地方慈善組織種種社會救治行為、國家和地方爭奪戰後紀念和祭奠儀式的話語權，以及戰爭對於普通百姓心靈造成的創傷。全書共七章，除最後一章「尾聲(Endings)」以外，各章分別以一個詞語命名統領。對於此類章節名稱的選取，梅爾清認為它們凸顯了因戰爭之喪損而產生的、對於生活的幻滅和無力感以及難以彌合之悲痛(頁17)。第一章「戰爭(War)」，為讀者簡單講述了戰爭的概況：交戰雙方、戰爭過程和戰爭的影響。之後，她介紹了中國及西方學界目前有關太平天國研究的常規思路，或在梅爾清自己看來，為研究視角之桎梏。她認為，學界在考察這場可以被稱為「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內戰」時，過多重視交戰雙方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較量，而忽略了戰爭最本質的東西——對人民日常生活的破壞。百姓對於一場戰爭的記憶並不會是誰勝誰負或高層政局的重新洗牌，他們記住的往往是帶來切膚之痛的顛沛流離、妻離子散以及家破人亡。因之，她開篇名義地確認了自己的寫作態度：她要寫